

囚禁的 天空

Christine Leunens

〔新西兰〕克莉丝汀·莱南斯 著

曾琳 译



CAGING SKIES

为了你，我愿意跟这个世界奉陪到底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囚禁的 天空

Christine Leunens

〔新西兰〕克莉丝汀·莱南斯 著

曾琳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囚禁的天空 / (新西兰) 克莉丝汀·莱南斯著 ; 曾琳译 .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20.5
ISBN 978-7-5500-3706-9

I . ①囚… II . ①克… ②曾… III . ①长篇小说—新西兰—现代 IV . ① I6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28031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14-2019-0205

CAGING SKIES By CHRISTINE LEUNENS

Copyright: © CHRISTINE LEUNENS 201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USIJN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囚禁的天空

QIUJIN DE TIANKONG

[新西兰] 克莉丝汀·莱南斯 著 曾琳 译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夏童
责任编辑	兰瑶
特约策划	谭欣
特约编辑	李青尘
封面设计	樱瑄
版式设计	彭娟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3706-9
定价	45.00 元

赣版权登字 : 05-2020-2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致 谢



在此感谢以下人员对本书研究资料提供的帮助：法国卡昂和平纪念馆博物馆的阿克塞尔·佛罗伦萨·法里博、卡洛里·莱查理；维也纳已过世的西蒙·维森塔尔和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来自维希法国被驱逐受害者纪念中心的保罗·施耐德；奥地利抵抗运动档案中心的乔治·施皮奈尔和乌苏拉·施瓦茨博士；维也纳历史委员会的伊娃·贝利米林格；来自巴黎的奥地利文化论坛的约塔·斯图尔曼；来自哈佛大学神学院的詹姆斯·L·库格尔博士；来自RZB奥地利的维拉·斯图尔曼和伊丽莎白·高特。除此以外，还要感谢安妮莱森·麦克森，来自艾博市的艾米丽，安东尼·波提博士，莫提克·芬妮，弗朗斯·格兰戴尔·凯利博士，已去世的莫里斯·维恩博格博士，安德列斯·培卢瑟聂尔和她的父亲，已过世的乔纳斯·培卢瑟聂尔。我对哈里特·艾伦的真知灼见感激不尽，感谢瑞秋·斯科特和卡莱尔·嘉莫为我提出有关编辑方面的建议。感谢克劳迪娅·科德、约瑟芬妮·卡柏·格雷罗、玛丽孜娅·巴尔梅林和伯纳德·图勒的字幕翻译；感谢马可·文森提尼、克里斯丁·贝瑟和菲利普·雷不辞辛苦的编辑工作，再次特别要感谢克里斯丁·贝瑟和菲利普·雷为该书简版的编辑工作。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劳拉·苏伊和贝雷塔·诺伊从我撰写初稿伊始就对我抱有坚定的信心。

致我的丈夫，阿克塞尔



楔子



谎言最可怕之处不是讲述虚假的空话，因为假的终究是虚妄之言，但是它们最终会在别人脑海中变成真正的事实。它们脱离了撒谎之人的控制，就像随风飘荡的种子，在你最不在意的地方生根发芽，直到某天撒谎的那个人发现曾经的种子已经在荒凉的悬崖边长成了苍天大树。这虽然让撒谎的人开心，但更多的却是悲伤。这棵树是如何长在这里的呢？它又靠什么生存呢？在这种孤寂之下，它是那么美丽，虽然扎根在虚妄之言的荒原之上，但却绿意盎然，生机无限。

自从我撒了这个谎之后，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还是得细细梳理它的枝叶，看看究竟哪些源自确凿的事实，哪些源自虚妄的谎言。我能不能在锯下所有基于谎言的枝叶的同时，还不会对这棵树造成太大的伤害？或许我该把这棵树移植到肥沃的土壤。但是这样风险太大，因为它已经适应了谎言，学会了如何在狂风中弯曲枝干适应风势，习惯了匮乏的水源。它太过弯曲，以至于一部分枝叶和地面保持垂直，甚至深入高耸而毫无生机的悬崖里。但是它也没有倒在地上，它的树叶在晨露中

腐烂，就好像我把它移植到了别处一样。弯曲的树干永远不会直起来，就好像我也不能挺直身板就回到 20 岁。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换一个更加温和的环境反而会有致命风险。

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如果我说出真相，那么悬崖就会被一点点腐蚀殆尽。至于我自己的书又会有怎样的命运？我向天空握紧拳头，然后放飞我的祈祷。不论它们飘落何方，我希望我的祈祷之树能够在那里生根发芽。

第一章



我叫乔纳斯·德特莱夫·贝泽勒尔（小名乔乔），1927年3月25日生于维也纳。从我母亲的相簿照片上来看，我刚出生时是个又秃又胖的小宝宝。翻看照片时，猜测究竟是我父亲、母亲还是我姐姐抱着我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小时候和其他婴儿没有什么区别：笑的时候会露出一嘴光秃秃的牙床，对自己的小脚丫子充满好奇，涂在自己脸上的梅果酱比吃进嘴里的还多。我对于一个比自己大两倍的粉红袋鼠情有独钟，总是拖着它到处爬。我显然不喜欢别人塞进我嘴里的雪茄，这一点可以从照片中我号啕大哭的样子得到证明。

我与父母关系很亲密，和爷爷奶奶关系也不错。我从没见过我的外公和外婆，他们在我出生前就死于一场雪崩。外公和外婆来自萨尔茨堡，他们是远近闻名的徒步旅行者和滑雪高手。据说外公可以凭着鸟儿的歌声就知道是什么鸟在叫，或者通过树叶被风吹过的声音就能判断树的种类，连看都不用看一眼。我父亲也对此坚信不疑，所以我相信母亲没在这件事上撒谎。父亲说外公曾经告诉他，每种树都有自己的低语。母亲

给我讲了不少关于外公外婆的事情，所以我也对他们非常了解，敬爱有加。他们如今早已升入了上帝的国度，在天堂注视着我，保护着我。也因为如此，晚上我去上厕所爬起来的时候不会有怪物从床底伸手抓我的腿，也不会有坏蛋在我熟睡的时候用刀刺穿我的心脏。

我们给爷爷的外号是“Pimbo”，给奶奶的外号是“Pimmi”。但是奶奶的外号在德语里会加一个“chen”的后缀，意思是可爱的小东西。这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因为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称呼似乎让奶奶的身份有点“缩水”。这些都是我姐姐小时候编出来的名字。爷爷是在一场舞会上认识奶奶的，那是一个典型的维也纳舞会。爷爷看到奶奶在和她衣着光鲜的未婚夫跳着华尔兹。趁着那位男士去拿香槟的工夫，爷爷上前恭维他的未婚妻是多么漂亮。但是他却告诉爷爷，那是他的姐姐而已。从这以后，爷爷就再没给他机会和奶奶跳舞。舅爷爷艾格特只能坐在一边拨弄着大拇指，因为在场的其他女士和他的姐姐比起来实在相貌平平。当三个人离开舞会的时候，爷爷带着他俩走到停在马车后面的奔驰车旁。他把胳膊搭在汽车的椅背上，好像自己就是这车的主人。他神情恍惚地看着天，然后说道：“真遗憾车里只能坐两个人。今晚多么美妙，不如我们一起走走吧？”

奶奶曾经在维也纳被两个维也纳的杰出青年追求过，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爷爷。因为她认为爷爷更帅、更聪明、更体贴而且有钱。当然最后一点并不存在。爷爷那时候比普通的小市民还要穷，婚前几个月爷爷带着奶奶去各种高档餐厅和剧院都得去找银行借钱，这无疑让爷爷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不过那些都是善意的谎言，因为爷爷在遇到奶奶前的一周，用从银行借来的同一笔钱开了一家生产熨斗和熨衣板的工厂。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他们也最终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奶奶总是喜欢和我们讲结婚前的龙虾与香槟是如何变成婚后的沙丁鱼和自来水的。

我的姐姐乌特死于糖尿病，临终前距离她的12岁生日就差四天。在她给自己打胰岛素的时候，我是不被允许进她的房间的。但有一次，我听到妈妈告诉她如果肚子疼的话就把针打在腿上，我就擅自闯进房间，看到她刚好把德国特色服饰拉上去，露出了自己的肚子。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忘了给自己打胰岛素。我妈妈问她给自己打针了没，她就“嗯嗯”应付过去，但是随着针打得越来越多，她的回答也就多了几分回避的意味，而不是肯定的回答。

让我感到悲伤的是，我对她的小提琴的记忆远比我对她的记忆要多得多。我依然记得小提琴黑色的琴背和条纹标记，我姐姐涂在琴弓上的松脂味道，还有那拉琴时从上面腾起的烟雾。有时候她让我来试试琴，但是又不让我碰琴弓上的马鬃，不然弓弦会发黑。想学着姐姐的样子紧紧琴弓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会弄坏琴弓；拨弄弦轴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会拉断琴弦。我那时候还太小，没法把这些要点都熟记于心。我要是运气好能拉得动琴弓，那么发出的声音也只有我自己能欣赏那是什么玩意儿。每到这种情况，姐姐和她迷人的小伙伴就会爆出一阵大笑，然后妈妈就会大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去帮她完成只有她勇敢的儿子才能完成的“高难度”家务活。不论我怎么努力，都不能像姐姐那样拉动琴弓，不是碰到琴马就是戳到了墙上或者某人的眼睛里。接下来就是小提琴从我的手里拧走，然后我被“送出”房间，我的尖叫和抗议完全不起作用。乌特和她的朋友一边咯咯大笑一边拍着我的脑袋，然后关上房门继续练习。我对这一切依然记忆犹新。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她唯一的回忆是起居室的小桌子边上姐姐的照片。在随后的岁月里，我记忆中的亲人不再鲜活，对他们的思念都凝在了这些定格瞬间的照片上。我无法让照片中的人再活生生地动起来，最多不过是在命运出现转折的时候，看着照片中的亲人发自内心的微笑。

乌特死后不到两年，爷爷也因为糖尿病去世了，他死的时候 67 岁。虽然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当他从糖尿病导致的昏迷所引发的肺炎中苏醒过来后，爷爷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悲伤中。他认定是自己把糖尿病遗传给了乌特。我父母说爷爷是死于自己的悲伤。那时候奶奶已经 74 岁了，我们也不想让她的日子太难过，所以就把她接过来住。一开始奶奶并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她觉得这会干扰我们的生活，所以每天早饭的时候她都向我们保证她不会打扰我们太久。我们谁都不想让她过早离世，虽然每一年都可能是奶奶的最后一年。每当圣诞节、复活节和奶奶的生日之时，爸爸都会眨着湿润的眼睛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和奶奶一起过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本应对奶奶的长寿抱有信心，但是我们却越发怀疑奶奶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我们家位于维也纳西郊的第十六区，那地方也叫欧塔克林。我们的房子看着很气派，外面涂的颜色和美泉宫一样。虽然我们家还在维也纳市的管辖范围内，但是房子周围有森林环绕，除了肖顿森林和杰明顿森林两片大森林以外，还有不少绿油油的草地。当我们从维也纳市中心返回家中，我直观的感受是自己住在乡下，而并非住在奥地利的首都。人们说欧塔克林和黑尔纳尔斯都是最不宜居住的地区。按照上了年纪的人的说法，它向市区延伸的区域都住满了怪人，我怀疑是因为那里的人都非常穷或者不择手段赚钱摆脱贫困。幸运的是，我家住得离是非之地比较远。从我家窗子望出去并不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这些葡萄晒了一个夏天之后酿出的葡萄酒非常有名。但沿着蜿蜒的小路，只要骑上几分钟的自行车就能看到它们了。窗外能看到我们邻居的房子，一共三间，不是涂成浅黄色就是草绿色。这些都是代替美泉宫的色调常用的颜色。

爷爷去世后，我父亲接手了工厂。因为爷爷在世的时候，父亲就帮他管理工人，他有相关的经验。虽然母亲警告过父亲企业太过庞大，会

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他还是收购了雅科夫电器公司。这家公司虽然没有贝泽勒尔熨斗厂那么庞大，但是业务也涉及世界各地，每年利润颇丰。父亲辩解说零再多还是零，再多也不嫌多，况且多一点是一点。他对于他的合作关系非常满意，“雅科夫与贝泽勒尔”公司的全新熨斗和电器很快就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海外市场。我父亲买了个地球仪，一天晚餐后，他给我指出了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位置。我脑子里则幻想希腊人、罗马人（我以为罗马尼亚住的都是罗马人）和土耳其人穿着熨烫得笔挺的长袍是个什么样子。

在我的童年里有两件事，算不上什么大喜大悲，也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情，但却记忆深刻。有一次在我妈妈做沙拉时，我一下就发现菜叶子中间藏了只蜗牛，妈妈手腕一抖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我们家有好几个垃圾桶，其中一个是用来装菜叶、果皮和蛋壳的，妈妈会把这些垃圾埋进我们的花园。我担心蜗牛也会被埋进去，因为看起来它似乎也是不错的肥料。我母亲从来不让我养狗或者猫，因为她对动物毛发过敏。经过我的软磨硬泡和她再三犹豫后，虽然妈妈带着一脸不适，她还是同意让我把蜗牛养在一个盘子里。我妈妈是个大好人。我每天都给蜗牛喂莴笋，它后来长得比我见过的所有蜗牛都大，尺寸和我的拳头一样大。好吧，可能还差了点儿。每当它听到我靠近的时候，就把脑袋伸出壳，摇晃着身子，把触角伸过来，所有这些动作都是慢悠悠的。

有一天早上我下楼发现我的蜗牛不见了。但我很快就找到了它，然后把它从墙上拔了下来，放回盘子里。这都变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晚上它就逃跑，然后我早上再把它从桌腿、展示架上的莫森瓷器、墙纸或者某人的鞋子上抠下来。有天早上我快迟到了，我妈妈说要是吃完早饭还有时间就去找蜗牛。她说完就把托盘放到了长椅上，然后我们就听到了什么东西被压碎的声音。妈妈翻过托盘看到我的蜗牛被压了个粉碎。我

当场哭得稀里哗啦，完全和我的年纪不符，以至于爸爸都跑过来，还以为我用切肉刀伤到了自己。他对蜗牛的事无能为力，况且还有工作等着他，所以妈妈就答应我把蜗牛壳补好。鉴于我已经泣不成声，她最后同意我今天不用去学校。

我找到胶水，想把蜗牛壳粘起来，但是妈妈担心胶水对蜗牛是有毒的。她建议我们最好还是靠滴水来保持它的水分，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小时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小伙伴逐渐萎缩。奶奶建议我们去乐维利尔酒店——一家位于阿尔贝蒂娜广场的法国饭店——买一包食用蜗牛的壳。我们马上出门买来了蜗牛壳，然后放在了盘子上，但是蜗牛就是不想从旧壳里出来。最后在我们的帮助下，萎缩的蜗牛终于“钻”进了新壳里，但是旧壳的碎片还贴在它的背上。经过两天的照料和担忧，我终于可以确认我的宠物已经死了。要说我为什么看重蜗牛的死甚于我姐姐和爷爷的去世，可能是因为我长大了，能够理解死亡意味着再也不能看到你想看到的蜗牛或是亲人了。

另一件事甚至都算不上事。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的父母出去吃饭，或者是去看展览或者歌剧，奶奶和我在煎锅里化了一整条黄油，还放了肉片。我俩站在炉子前面，拿着面包在锅里蘸了蘸后直接送进嘴里，我们的叉子很快就烫得不得了。之后奶奶还给我做李子酱焦糖松饼当甜点，我在一旁看着各种原料被一股脑全都倒进锅里，开始眼花缭乱。通常来讲，妈妈连做梦都不允许我梦到这些东西，因为她担心任何太甜的东西都会让我得糖尿病。但是这种“偷偷吃”的行为让松饼变得更好吃了。

1938年年中的一天，我父亲带我去见一个专门给残疾人做鞋子的鞋匠。我之所以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的生日快到了，而且鞋匠的墙上还有个日历。在我们排队坐着等候的时候，我不停算计着还有多久才能过生日，因为我知道父亲母亲会给我一个从中国送来的方形风筝。父

亲的扁平足严格来讲也不算什么残疾，但是他整日都得站着上班，所以也是非常痛苦。奶奶也找这个鞋匠修过鞋子，所以我们对于古博尔先生非常尊敬。奶奶说，古博尔先生简直能改变别人的一生，因为脚疼会让老年人失去活下去的意志，而古博尔先生无疑改变了很多老人的生活。当古博尔先生做鞋的时候，他把这份工作当作一种使命，用每一双鞋去弥补岁月给脚带来的囊肿、鸡眼和肿块。他的生意好得不得了，狭窄的店铺里弥漫着皮革和鞋油的味道，还是有十几个人在排队等候。

我在店里踢腾着腿打发时间，忽然门外传来一声巨响，好像天都塌下来了。我跳起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但是爸爸叫我把门关上，打开门只会让房里更冷。我接下来就记得整个维也纳的人都在叫嚷着同样的话，但是声音太大，听不清说的什么。我问爸爸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古博尔先生完全无视了外面的喧闹，他继续测量着一个男孩的左脚。这个男孩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脚的鞋子得加高十厘米才能合得上停止发育的左腿。等到古博尔先生为我父亲量尺寸的时候，我父亲都快站不住了。特别是古博尔先生量完了脚又去量腿，如果尺寸有偏差的话，对背不好。他对所有人都那么好，奶奶说古博尔先生是个很体贴的人。

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了英雄广场，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那个场面。我问父亲是不是有一百万人，他说可能有个几万人吧。我不觉得有什么区别。光看着这群人，我都感觉自己要被淹没了。有个人站在新霍夫堡皇宫的阳台上大声叫嚷着，下面的人群也被他的狂怒和激情所感染。我看到大概一百个大人和孩子爬上了尤金王子和卡尔大公雕像的马背上，从上面看那个人演说。我也想爬上去，便央求父亲，但是被父亲拒绝了。现场有音乐、喝彩和飘扬的旗帜，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简直太棒了。他们旗帜上的标志看起来就像风车的

叶片，风一吹就能转起来。

坐在回家的电车上，父亲失神地盯着窗外。因为父亲不让我参加集会，我变得闷闷不乐，明明我们近在咫尺。这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呢？浪费父亲几分钟宝贵时间？我静静地看着父亲，他的相貌温文尔雅，但是一脸闷闷不乐的表情在作为儿子的我看来，虽然很不想承认，但不得不说非常难看。他紧闭着嘴巴，表情凝重，鼻子线条分明，眉毛却拧在一起，眼睛盯着什么东西，哪怕是我都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他的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看起来很职业化，就好像能帮着推销自己的产品一样。我心里暗想：我的父亲更关心自己的工作、利润和工厂，而不是如何让家人更开心。但是我的愤怒慢慢消散，然后又觉得他很可怜。他的头发不再整齐，头发在头顶更为稀疏，还盘结在一起。我借着电车转弯的力道用力靠在他身上。

“爸爸，”我问道，“阳台上的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男人，”他一边回答一边将我搂起来，目光并不在我身上，他的手臂时松时紧，对我疼爱有加，“和你这个小家伙没关系，乔纳斯。”

第二章



几周后，来了两个人把奶奶放在担架上抬走，好让她能给德奥合并投票。所谓给德奥合并投票就是看她是不是愿意让奥地利变成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一个省。我的父母一大早就出门投票了。而我奶奶之所以要让人抬着去投票，是因为她在去药店买治膝盖的薄荷膏的路上，踩到冰上滑了一跤，摔到了髌骨。

“我那天去药店真是太走运了，”她告诉那两个男人，“它治好了我的关节炎！千真万确！我现在根本不在乎我的膝盖了，因为我的髌骨更疼！治疗疼痛的最佳良药就是让别处更疼。”

两个人尽力大笑以呼应奶奶的笑话。他俩穿着制服显得非常优雅，但是我却感到非常难为情。因为我知道对他们来说，奶奶不过是一位老妇人。

“夫人，在我们出发前，我想问下您带身份证件了吗？”其中一个人问。

奶奶耳朵不是很好使，所以我就代她回答，但是她实在太过兴奋以

至于没有听到我说话。她在两人抬起担架的时候还说个不停——把自己比作引荐给恺撒的埃及艳后——直到其中一人差点失手将她摔下去，然后她就开始说自己是坐在飞毯上飘过巴比伦。她给他们讲在边界和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前，自己和父母的生活是多么不同，以及她是多么希望维也纳能够再次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奶奶幻想着德奥合并能重现奥匈帝国的荣光。

奶奶回来的时候筋疲力尽，非常需要睡一觉。但等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她又回到沙发上开始看起报纸，报纸看上去就像一对不听话的翅膀。我光着身子蹲在毯子上，妈妈坐在我身后用镊子从我背上和脖子上拔走蜜蜂的刺，然后用棉球往伤口上抹消毒酒精。随后在那些最不可能的地方检查是否有蟊虫：手指间、脚趾缝、耳朵、肚脐眼。虽然我十分不愿意，母亲还是检查了下我的屁股缝。她警告过我去葡萄园放风筝的后果。

为了不被加上更多的限制，我只能一五一十地说了实情：“我原本想去空地放风筝，但是那里风不够强。我只有跑起来才能保证风筝不会掉下来，哪怕停下喘口气都会使风筝线松弛让风筝往下掉。等我跑到葡萄园边上的时候就立刻停下来了，但是风筝落到了园子里面。这点我保证，我可没说瞎话。我只能自己进园子去捡风筝，这可是你和爸爸送我的礼物。”

“下次风不够大的时候，”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时不时拉住我的一撮头发，“试着往反方向跑，离葡萄园远一点。空地大着呢，随便你跑。”她一脸怀疑地抬着眉毛俯视着我，然后把我的衣服团成一团扔到了我头上。

“好的，妈妈。”我回答道，暗自庆幸不用接受进一步的惩罚。我用最快的速度穿衣服，但是母亲还是一巴掌拍到了我的屁股上，说道：“傻小子。”